

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机理与路径

郭跃文 向晓梅 万 陆

[摘要] 工业化深化是在完成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初步转型之后,以建立技术自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为目标、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主要路径,通过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高级阶段。当今全球资本和产业等要素流动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既为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扩大了机遇窗口,同时也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深化的空间,导致发展停滞乃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把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解释框架之中,分析了支撑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内在机理,梳理了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的阶段特征、路径选择。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中国经济特区适时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改革开放优势与创新文化特质,形成了有别于波特钻石模型的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组合。以此为依托,中国经济特区完成了纵横两个维度的工业化深化。在纵向维度,工业化深化是一个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培育和壮大竞争优势的演进过程。在横向维度,工业化深化表现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及城市化提升的多路径协同发展。

[关键词] 经济特区 过早去工业化 工业化深化 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 F4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20)06-0005-14

一、引言

工业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拓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原有完备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了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工业依然存在着发展质量不够高、发展布局不够均衡的隐忧。从发展质量来看,尽管我们在部分产业上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与“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然受制于人。从发展布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势头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依然任重道远。此外,受到国内人口红利消退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中国经济中的工业部门产出比重已经出现了持续10年的下降。虽然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在高质量工

业化的基础之上。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工业比重下降过快过猛，很可能是该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受阻、产业正在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信号（Castillo & Neto, 2016; Rodrik, 2016, 2017）。学术界将这种状况称为“过早去工业化”，会直接削弱国家工业化的后续动能，迟滞经济增长，甚至诱发“中等收入陷阱”（丹尼·罗德里克，2013；魏后凯与王颂吉，2019；史丹与白骏骄，2019）。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我们能否保持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拉动引擎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全面夯实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根基，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技术依赖走向技术自立，从局部突破走向全面领先，从不均衡不协调发展走向均衡协调发展。将其放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大进程中来看，就是要推动工业化进程全面深化。

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对工业化深化概念的明确定义。从已有文献看，对工业化深化概念通常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就是解读为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早期”到“工业化中期”、再到“工业化后期”、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阶段推进，另一种是将工业化深化解读为从规模扩张转为质量提升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升级。这两种解读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笼统，没有解释清楚工业化深化所面临的具体外部约束、推动工业化深化的实施机理和路径。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当下，还是全球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成功启动工业化，实现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结构性转变之后，都面临着因产业升级困难、生产效率提升缓慢而导致的过早去工业化威胁，这是工业化深化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外部约束。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尝试将工业化深化定义为在实现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初步转型之后，以建立技术自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为目标、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主要路径，通过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高级阶段。

中国经济特区 40 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为研究工业化深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案例。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到 2020 年，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代表的中国最早一批经济特区已经成立了 40 周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实现了“五大历史性跨越”：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积累了“十条宝贵经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习近平，2020）。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也赢得了举世赞叹，被国际友人誉为挂在共和国胸前的勋章（深圳特区报，2015）。

不仅仅是深圳，中国各个经济特区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 40 年间，深圳 GDP 平均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85 倍、全国的 1.80 倍；珠海是世界的 3.69 倍、全国的 1.36 倍；厦门是世界的 3.5 倍，全国的 1.3 倍；汕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77 倍。可以说过去 40 年，世界每向前走一步，中国经济特区就跨前了 4 步（郭跃文和向晓梅，2020）。要真正理解这个成绩有多么了不起，最直观的方法是与全球其他特区作国际比较。截至 2019 年，全球已经建成了 5400 多个经济特区，多数特区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特区类似，以吸引外资、发展外

向型经济为政策诉求。但没有一个特区能像中国经济特区这样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一项对全球 364 个经济特区样本进行的跨国研究表明，只有 19% 的特区经济增速超过了所在国的经济增速，55% 的经济特区和所在国增速一致，还有 26% 的经济特区增速低于所在国增速。即便是那些实现了高增长的特区，其高增长时期往往也只有几年时间，无法做到如中国经济特区这样，保持 40 年的高速增长（UNCTAD，2019）。

中国经济特区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经济特区建设的“优等生”，做成了世界多数经济特区没能做到的事情，是与中国经济特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发展道路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之路，始于其成立之初发展“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贸易，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化分工。但仅凭这种低附加值工业是不可能支撑中国经济特区 40 年高速增长的。1980 年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设立时，中国人均 GDP 尚不足 200 美元。到 2019 年，深圳人均 GDP 逼近了 3 万美元，珠海突破了 2.5 万美元，厦门也突破了 2 万美元大关，蒸蒸日上的收入攀升意味着低成本比较优势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经济特区并没有如多数发展中国家那般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而是在全国率先成功摆脱了“低成本路径依赖”，成功迈上了一条从“三来一补”到高新技术产业主导、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深化之路。本文尝试把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解释框架之中，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内在机理，梳理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的阶段特征、路径选择。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中国经济特区适时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演化。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特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改革开放优势与创新文化特质，形成了有别于波特钻石模型的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组合。以此为依托，中国经济特区完成了纵横两个维度的工业化深化。在纵向维度，工业化深化是一个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培育和壮大竞争优势的演进过程。在横向维度，工业化深化表现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及城市化提升的多路径协同发展。

二、工业化深化的全球挑战

后发赶超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工业化要经历两个阶段、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实现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变。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工业化启动阶段，其难点在于如何打破农业经济体资本、技术缺乏以及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的限制。第二个阶段的任务是实现工业部门的质量提升，其所包括的内容要比单纯的规模扩张广泛得多，包括：持续提高生产效率、建立以资本知识密集型主导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体系等。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工业化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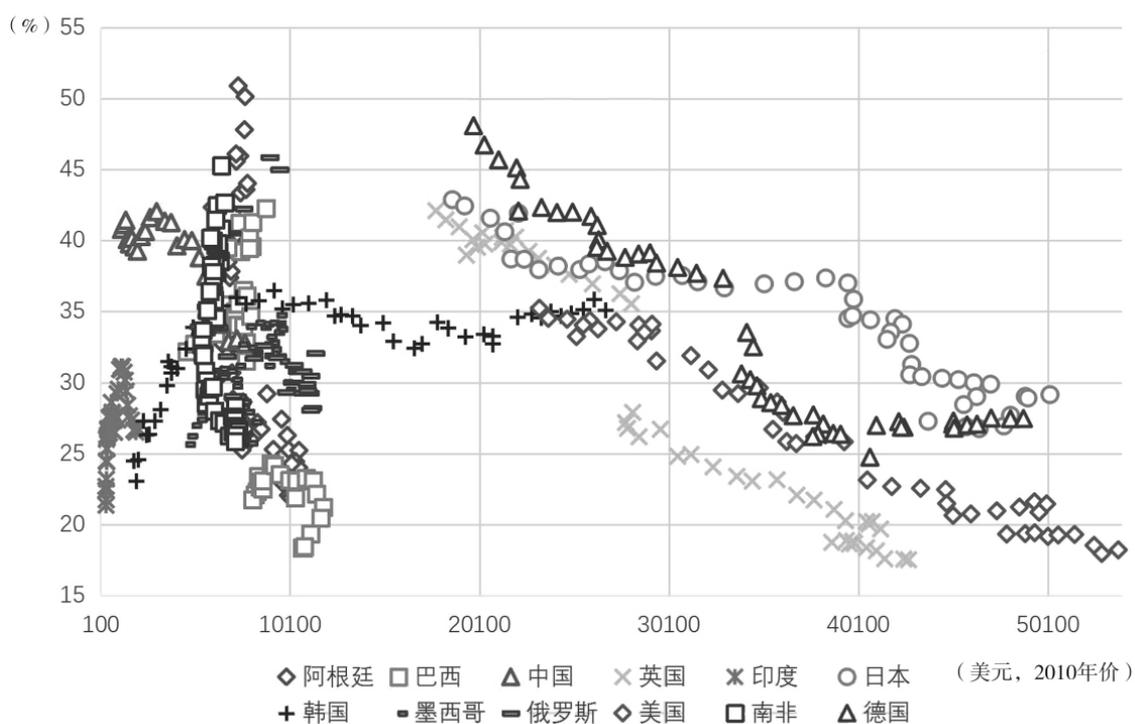
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化启动难题，但又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工业化深化程度不足的风险之中。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启动阶段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一旦国民收入上升超过一定幅度，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容易向更低收入的国家与地区再转移，而不是进行就地产业升级。换句话说，国际资本和产业流动便利化大大压缩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深化的空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出占 GDP 比重的峰值通常在 20% 左右，此后制造业比重开始缓慢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进入 21 世纪以来，制造业比重的峰值已经下降到 14%（Newfarmer et. al.，2018）。

为了更直观理解工业化深化挑战，我们分析了全球 12 个代表性经济体从 1970 年到 2018 年

的长期增长路径。图 1 的横坐标是各国在不同时期的人均 GNI，统一换算成 2010 年美元价，使得收入变化跨期可比。纵坐标是各国各年度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12 个经济体中包含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四个高收入国家。在图 1 中，高收入国家所有时期的样本点均位于图形右侧，从长期增长路径来看，过去半个世纪，高收入国家虽然工业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但人均 GNI 一直在增长，从 1970 年约两万多美元上升到现在的 4.5~6.5 万美元区间。工业比重伴随经济增长而下降，是与高收入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阶段特征一致的，我们将其称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增长路径。通过接下来与其他类型国家的发展路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去工业化增长路径只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中。

图 1 的左侧区间集聚了包括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以及阿根廷、墨西哥、韩国等其他代表性的拉美和东亚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包括俄罗斯、巴西、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在内的一批国家，人均 GNI 很早就抵达了 1 万美元附近，随即出现了工业占 GDP 比重快速下降与国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并发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过早去工业化停滞。由于这些国家在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进入长期停滞期，导致图 1 中，发达国家样本点分布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点分布之间有一片明显的空白地带，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左到右成功跨越，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过早去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社会去工业化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后工业化社会去工业化是由于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对劳动力投入需求减少而导致的。因此，这种过早去工业化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则源于生产率提升缓慢，产业竞争力下降，本国工业部门被外国竞争者替代所造成的（Rodrik, 2016, 20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数据库。

图 1 全球 12 个代表性国家的长期增长路径

剩余 3 个国家样本中，印度尚未达到触发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水平、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韩国，人均 GNI 已达到 3.2 万美元左右。韩国是怎么做到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成长路径不同，韩国工业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大致保持了稳定的水平，避免了过早去工业化。限于数据可得性，图 1 没有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数据，但根据 1970 年日本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工业产出占比仍高达 42.4% 的情况，可以合理推断出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日本同样避免了“过早去工业化”。显而易见，工业化深化是发展赶超的动力源泉，相应地，我们将这种增长路径称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工业化深化赶超。

由此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已经不再是个理论上的难题。阻碍发展中国家后发赶超的主要瓶颈，已经转移到如何实现工业化深化上。传统上，我们常说“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可以更针对性地表述为“工业化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因素”。

三、竞争优势支撑的工业化深化机理分析

过早去工业化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业化深化机理。工业化深化是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复杂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是通过建立开放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实现的。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比较优势的动态改进视为支撑工业化深化的内在机理。这些学者认为，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有效完成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当一国比较优势升级之后，这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会发生相应的提升，由此自发推进了工业化深化（林毅夫，2012）。但是，更多文献表明，发展中国家调整提升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和科技优势，在高端产业部门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形成强大压力，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Schmitz, 2004; Wolfe & Lucas, 2005）。因此，另一批学者认为，比较优势仅仅是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起点。只有着眼于培育和壮大在高端产业部门和自主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才能成功推动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洪银兴，2002，2010；白雪洁、于庆瑞，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

波特是竞争优势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他将创新和技术进步视为真正可持续的核心优势（Porter, 1990）。竞争优势理论要回答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创造比竞争对手更快速的创新环境和技术进步环境，从而协助本地企业在相关产业保持长期领先优势，或者成功进入新的目标产业。波特为此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列举出构成竞争优势的四大关键要素，分别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产业配套、企业战略。但是，波特的竞争优势模型主要是基于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提出的，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国情。例如，波特竞争优势模型特别强调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意味着只有充分投资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才能发展出竞争优势。而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会对发展中国家研发投入形成强烈挤出效应，国际产业转移也往往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太多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深化需求而言，就需要另辟蹊径。

在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特区成功推动了从“三来一补”到高新技术产业主导的工业化深化。支撑这个过程实现的，是中国经济特区以产业升级为抓手，逐步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

产业领域建立起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竞争优势。由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起点差距，构成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与组成波特钻石模型的四要素既有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

第一，生产要素。任何生产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培育竞争优势首先要求具备良好的生产要素条件，这是中国经济特区钻石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唯一完全一致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即便如此，中国经济特区在高级生产要素的形成机制上也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是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丰富的数据等等，这是竞争优势理论着重强调必须拥有的，需要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才能获得。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在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上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相比而言，中国经济特区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虽然有着人口资源红利构成的比较优势，但高级生产要素几乎完全不存在。为此，从中国经济特区设立至今，始终坚持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此吸引全国乃至世界资本和人才向中国经济特区集聚，缓解高级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竞争优势的制约。

第二，国际国内市场。波特的钻石模型将国内市场作为建立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而没有考虑国际市场。原因在于，波特认为，国内消费者对质量挑剔程度大小决定了本土企业对质量的执着程度，进而影响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波特的观点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因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对质量的挑剔程度通常比较低，对推动建立竞争优势的帮助相对有限。中国经济特区一开始就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本土企业不仅要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质量标准，更多时候着眼于满足海外消费者的质量标准。在这些海外消费者中，既有挑剔的发达国家消费者，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也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区企业在全球市场范围参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必须按照国际市场标准开展生产、实施创新，既拓展了特区企业的视野、拓宽了特区企业的技术渠道，同时也给特区企业施加了更大的技术进步压力。

第三，产业和创新体系。在波特钻石模型中，对应的关键要素只是产业配套，并没有另外提出需要有创新体系。原因在于，波特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以产业集群为形态的产业配套体系天然就具备创新功能（Porter, 1998）。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大量产业集群长期陷于“低成本竞争”的状态，只具备产业配套能力，缺乏必要的创新能力（王缉慈，2004）。中国经济特区之所以能成功走上高科技产业主导、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深化之路，不仅仅得益于围绕着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而且也得益于在产业配套体系之上不断发展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特区政府以产业发展政策为导向，引进了大量高校科研院所、组建重大科技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大规模推进创新孵化器建设，逐步建立起具有强大科技转化和产业孵化能力的创新生态体系，对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培育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四，特区创新文化。在波特钻石模型中，对应的关键要素是企业战略，它决定了企业是因循守旧还是创新进取。此外，波特还将政府作为钻石模型之外的重要辅助因素。但波特没有说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战略，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政府有为善为。大量研究表明，文化特质会对个人和企业战略决策造成重大影响（Franke and Hofstede, et al. 1991; Galor, and Ozak, 2016）。中国经济特区担负着中国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又有移民城市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特区文化具有强烈的创新特质。这促使特区企业战略具有浓烈的创新导向，敢于向世界前沿科技和前沿产业发起冲击挑战。此外，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新文化特质还塑造了改革型、服务型的特

区政府，既不因循守旧，也不骄傲自满，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推动改革，营造了一个支持企业创新、集聚资本和人才涌入的制度高地（厉有为，2011）。

最后，中国经济特区成功推进工业化深化，还得益于成功把握住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机遇。我们把它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钻石模型中的一个辅助要素。这与波特钻石模型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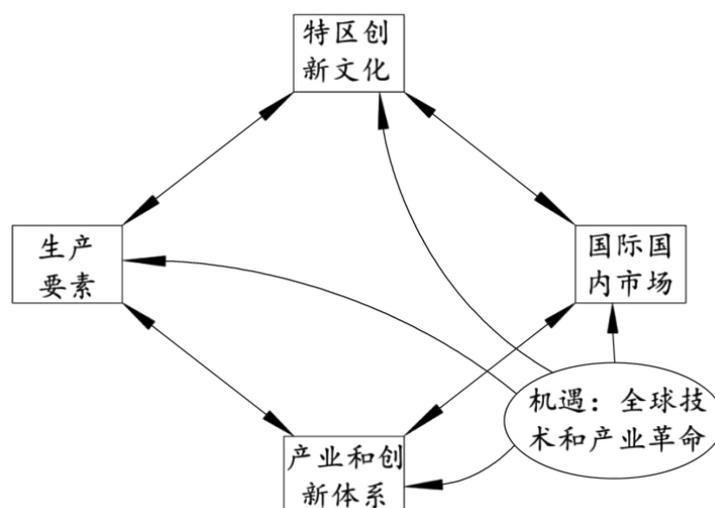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经济特区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四、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深化阶段

中国经济特区的40年持续高速增长是依靠持续不断的工业化深化为动力引擎的。尤其是深圳特区，成立之后几乎每10年就实现了一次产业升级，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回顾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深化进程，经历了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培育竞争优势，再到壮大竞争优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启动工业化，时间从1980年到1992年。

1980年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刚刚设立，草创之初百业待兴，资金、技术、人才严重匮乏，手上可打的牌只有低成本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土地。中国经济特区确定了积极承接海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海外资金、技术和市场发展工业化的战略思路。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提出了“四个为主”发展方针，“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此为指引，中国经济特区致力于承接来自海外、尤其是港澳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一批以电子、轻纺、建材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园区，主要生产电子表、印染布、服装、彩色电视机、自行车、微型电子计算机、塑料制品等轻工业产品。

发挥比较优势首先要建立外向型的经济体制，打破计划经济对要素流动的种种约束。中国经济特区以极大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勇气，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通过大力引进“三资企业”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开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着手探索建立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在内的要素市场，初步建立了要素市场体系，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运作机制。例如，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探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通过拍卖建立土地交易市场，促进了《宪法》有关条款修改，对中国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等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国经济特区还开始启动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框架。又例如，深圳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开启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探索中，特区的创新文化特质得以确立凝聚。

工业化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特区经济起飞。从1980—1992年，深圳GDP年均增长37.4%，远高于同期全国9.5%和全省14.1%的平均水平。1979年，刚建市的深圳市生产总值仅有1.96亿元，人均GDP仅606元。到1992年，已达317.32亿元。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在深圳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2年深圳出口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5.4%，“三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2.9%。其他经济特区也都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路径。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培育竞争优势，围绕引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启了工业化深化进程，时间从1993年到2012年。

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特区通过在全国率先开放获得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当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中外合资、“招商引资”的热潮，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不再显著。而特区内部土地资源也日趋紧张，劳动力成本等逐年上升。1993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特区正面临着原有比较优势无法支撑经济特区发展的严峻压力：“在深圳这个资源贫乏、空间有限的城市，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型产业的发展已越来越受到限制。深圳的经济发展要保持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增强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确立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在主导地位上的思想，舍此没有第二条出路”。

为了建立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特区开始下大气力引进高级生产要素，从对外引进起步发展本土高新技术产业。从1990年代开始，深圳重点引进了IBM、微软、朗讯等世界500强高科技企业，吸引到大批外商投资设立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加工制造基地。经济特区的本土企业也开始积极走出去拓展全球高科技产业市场，通过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合作，不断积累人才、资金、信息、知识等要素，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逐渐在电子元器件、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通信设备、家电类产品和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具备了独立生产和独立研发能力，并依托珠三角腹地，形成了配套体系完善的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初步建立起在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为了补齐本地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短板，特区政府开始大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科技人才回国发展创业。199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组团赴海外招聘人才，开全国先河。此后，特区政府全球招聘人才力度不断加大，各项便利人才自由流动、鼓励人才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出台，大大改善了特区高级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到2000年前后，中国经济特区开始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针对性引进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各种公共研发平台，并积极培育科技金融市场，产业链、金融链和创新链紧密互动的区域创新生态体系由此开始孵化。1997年，深圳市政府成立“深圳市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2004年5月深交所推出中小板，2009年设立创业板，大量VC、PE机构进入深圳，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深圳成为国内创投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创投公司数量占全国1/3。到2012年，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已经初步构建起产业链、金融链和创新链紧密互动的区域创新生态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快速成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新文化特质，激

励了包括华为、中兴、迈瑞、朗科、大族激光、华大基因等一批本土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特区政府也一直保持着改革创新的热情和勇气，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奠定了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干部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则进一步吸引了大批国内外优秀人才向特区集聚。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壮大竞争优势，工业化深化进入到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孵化新兴产业阶段，时间从2013年至今。

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特区在通信、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外围接口、消费类电子、光电、仪器仪表等领域，均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了全球独有的完整而高效的制造产业链。尤其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形成了从芯片到整机完备的电子信息上下游产业链，产业规模超2万亿元，约占全国行业规模的六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地。而且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产业链也非常完整，东莞、惠州等地的产业配套齐全，智能制造研发所需的零配件能迅速找到，服务也能及时跟上。

在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特区的现代金融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快速扩张，“金融+信息+制造”支撑了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完备。在深圳，以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2013年的49.4%提升到2017年的52.5%。深圳金融总资产、本外币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均居全国第三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由2013年的814.48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767.06亿元，占GDP的比重由5.44%上升至7.8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由2013年的463.76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701.29亿元，年均增速达10.89%，拥有物流企业超过1.7万家，营收超百亿元的物流企业近10家，涌现了6家物流上市公司。全国80%以上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总部聚集在深圳，美国UPS、德国汉莎、丹麦马士基、菜鸟网络等60多家知名国际物流企业落户深圳。

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特区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进一步被打破，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进一步充分释放，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创新综合生态体系。在创新主体方面，经济特区构建了以国内外著名高科技企业为引领，一大批新崛起的创新企业为中坚力量，创客空间以及各类创业型企业为重要补充的大、中、小、微企业间的阶梯式企业创新军团。特区政府则致力于优化人才引进和平台搭建，如深圳经济特区先后组建了大数据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先进电子材料研究院、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等10家新型基础研究机构，聚焦新兴产业的前沿技术领域，为深圳产业技术创新、源头技术供给提供保障。

依托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不断增强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国经济特区的竞争优势已经从生产环节全面转向创新环节，建立了强大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根据麦肯锡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对全球企业和创业者最具吸引力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之一，在中国最快完成原型设计的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公司内部研发的五分之一，并利用按需生产产能实现产品的全面投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依托于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效率的产业集群，中国经济特区的企业家即便同处于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也能以领先全球的速度对市场反馈做出反应，迅速转化为新的功能和设计。在全球技术变革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在创新上的速度领先优势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中国经济特区

在基础创新能力上还存在短板，但是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领域建立起的竞争优势，已经使得中国经济特区成为最具全球吸引力的新技术新产业孵化区之一。例如深圳已打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四路纵队”，形成经济增量以新兴产业为主、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等“三个为主”的产业结构。在5G、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已经挺进世界前沿。

五、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深化路径

工业化的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张培刚，2009），包括了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收入提升以及城市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革。如果说，工业化启动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主导产业转换的话，那么工业化深化所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深化之路主要是沿着四个方面推进的。

第一，产业持续升级是推动工业化深化的关键抓手。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随着技术、市场等发展动力的变化，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并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过去40年，中国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由“轻型、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到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再进入到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业态快速发展的持续性产业升级。在全球分工体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动陷入到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受跨国公司控制失去产业升级的主导权。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坐等由比较优势变化引导的“自发升级”。特区政府一方面高度尊重市场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和维持高效、竞争性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发挥政府战略谋划和公共品供应者的角色，前瞻性跟踪国际产业升级趋势，准确捕捉产业升级的关键点和痛点，制定引导性政策引导完善相关公共品供给，建立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市场环境。可以说，中国经济特区是政府与市场合力发挥得最好的地区，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优势支撑。1992年珠海市召开了首届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1993年深圳特区政府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是中国经济特区开始迈入工业化深化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商投资设立计算机和通信产品加工制造基地为突破口，通过产业培育和人才引进，为本土企业创造了一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特区由此走上了产业持续迭代升级的工业化深化发展道路。依靠产业升级，特区工业化成功经受住了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乃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等一系列重大考验。到了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区政府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盯住新一轮国际科技革命大趋势，围绕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制订了一系列前瞻性的产业培育行动计划和强链补链行动计划，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传统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新业态不断出现，并且成功孵化出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经济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迅速成为特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第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是工业化深化的重要支撑。工业化深化要求将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升级为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现代产业部门，此间必然伴随着要素资源的再配置和有效流动，由此带来了以金融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需求。中国经济特区成立之

初，金融部门仅仅是定位为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业务模式非常单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要求金融业与时俱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促使了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入世”后，一方面是国家金融改革创新提速在制度供给侧发力，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带来了对科技金融等新业态的需求，推动中国经济特区逐步建立起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大后，以更好地支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中国经济特区金融发展再度提速。深圳被批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将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展数字货币研究、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先行先试，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珠海则紧扣珠澳合作，探索建设澳门-珠海金融合作示范区，重点发展特色金融，并为“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提供金融服务。汕头着力于打造覆盖粤东、辐射闽西南和赣东北周边地区，在东南沿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厦门大力发展功能完备、创新多元的现代金融体系，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金融融合发展，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金融服务基地建设。中国经济特区以支撑实体经济为目标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中国经济特区的科技创新和高新产业孵化中发挥出突出的支撑作用。

第三，科技创新是工业化深化的动力源泉。历史上，所有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发展方式转变，支撑持续产业升级的背后是逐步增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经济特区之所以能顺利推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关键得益于中国经济特区逐步建立起创新综合生态体系，成功地从模仿创新走向了自主创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区政府开始有意识引进国内外高端科技创新资源，形成了以产业升级集聚科创要素，以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包括IBM、微软、朗讯等跨国高科技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制造环节和研发中心逐步落户中国经济特区，打通了高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通道，为特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学习机会。特区政府大刀阔斧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了特区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健全，勇于创新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壮大。此外，特区政府还积极为企业创新搭建平台，通过积极引进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机构，牵头设立政府风险投资基金、大力鼓励民间科技金融发展。如此多管齐下，才形成了今日功能健全、充满活力的特区创新生态体系。

随着创新生态体系日益完备，中国经济特区科技创新能力近年来实现了爆发性成长。2019年深圳PCT（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7459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0.6%，占广东全省总量的70.6%，连续16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其中华为公司以4637件居全球企业第一。到2020年，在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5G行业专利报告中，来自中国经济特区的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华为以3147件排名第一，中兴通讯以2561件排名第三。现在的深圳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出口加工区，而是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世界级创新城市。珠海、厦门等其他经济特区在创新发展上也各有特色各具胜场，各自培育了一批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

第四，城市升级是工业化深化的空间形态。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工业化进程带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增强了工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加快了知识扩散与创新，反过来助推工业化深化。从1979年到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从31.41万增至1343.88万，增长了41.75倍。珠海人口从36.07万增至202.37万，增长了4.62倍；汕头常住人口从291.98万增至566.48万，增长了0.94倍；厦门常住人口从90.78万增至429万，增长了

3.75 倍。

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国经济特区的城市形态不断完备，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业化启动时期，中国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以轻纺工业和外贸加工制造为主，生产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迂回生产程度都较低，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不大，对城市化发展水平要求不高，只需要有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功能配套即可，城市功能单一，还没有完全摆脱出口加工区面貌。从 1990 年代开始，伴随着特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特区要素集聚能力进一步加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快速增加倒逼特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城市治理水平快速提升。与此同时，迫于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那些附加值较低、占用空间较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从经济特区向周边城市转移，带动了周边城市的转型和发展，促使经济特区突破国际经济特区建设中常见的“孤岛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激发了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育。尤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特区产业高级化程度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特区已从早期简单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全面转向依托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这一方面需要中国经济特区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用国际化大都市的高标准进行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中国经济特区迅速推进与周边地区综合交通一体化建设，构建经济联系紧密、要素流动顺畅、协同创新发展的开放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现在，在珠江口东岸，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以深圳为中心城市，以“研发—制造”和“总部—分支”为区域分工形态的大都市圈，正在向空间绵延、梯度有序、功能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群方向发展。

六、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未来展望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深圳等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20）。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全局高度，指明了中国经济特区下一步工业化深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特区下一步的工业化深化，首先必须落脚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上。为此要求中国经济特区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内经济联系、构建联通全国的贸易网络、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按照中央部署，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可以预见，中国经济特区将进一步夯实基础科研能力，弘扬创新文化，完善产业与创新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开拓并举，进一步强化在全球范围内集聚与配置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增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新优势。

其次，中国经济特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任务首位，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中国经济特区必须加快形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新机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高标准打造以国家和省实验室、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为主要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支持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打好补“科技短板”攻坚战。各个经济特区应该进一步密切与区域内城市群之间、与全国其他创新城市之间的科技创

新合作协同，将特区竞争优势从科技成果产业化优势上升为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优势，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城市群发展共同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创新产业策源地，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基础领域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

第三，中国经济特区必须进一步升华特区的历史使命，从“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2019年8月，党中央出台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民主法治环境、现代城市文明、民生发展格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提出了全方位高标准的建设要求。其他经济特区也必须进一步强化特区改革开放探索先行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先行探索，走在前列，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典范。

第四，中国经济特区必须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成为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以来，不仅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的经济辐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开放辐射、改革辐射，有力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周边城市的高速发展，又以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的形式为中国经济特区提供了广阔而厚实经济腹地，是特区竞争优势建立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习近平，2019）。经济特区必须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要素集聚能力和人口承载力，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城市分工深化，率先引领构建起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最后，中国经济特区必须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承担起光荣的历史使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发展战略，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坚持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两个中心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深圳、珠海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进一步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湾区内部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推动湾区内部世界级城市群、世界级机场群和世界级港口群建设，促使湾区内部从传统的城市经济走向更加开放高效、集聚与配置要素能力更强的现代湾区经济形态。

参考文献

- [1] Castillo, M., Neto M. A.,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CLAC Production Development Series, 2016, No. 205.
- [2] Franke, R. H., G. Hofstede, et al., "Cultural Roo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search Not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2 (S1) . pp. 165 - 173.
- [3] Galor, O., W. Ozak., "The Agricultural Origins of Time Prefer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10) . pp. 3064 - 3103.
- [4] Newfarmer, R., Page J. et al., *Industries Without Smokestacks: Industrialization in Africa Reconsider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5]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 (6) . pp. 77 - 90.
- [6]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Y: The Free Press. 1990.

- [7] Rodrik, 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 (1) . pp. 1 - 33.
- [8] Rodrik, 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17, 12 (1) . pp. 1 - 7.
- [9] Schmitz, H.,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 [10]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New York: UN. 2019.
- [11] Wolfe, D. A. , Lucas. M. , *Global Networks and Local Linkages*, London: McGill - Queen' 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2] 白雪洁、于庆瑞 《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北京 《财贸经济》，2019 年第 8 期，第 132 ~ 145 页。
- [13] [美] 丹尼· 罗德里克 《过早开始去工业化的危险》，广州 《南风窗》，2013 年第 22 期，第 85 页。
- [14] 郭跃文、向晓梅 《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工业化道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 年。
- [15] 洪银兴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北京 《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12 期，第 6 ~ 10 页。
- [16] 洪银兴 《以创新支持开放模式转换——再论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北京 《经济学动态》，2010 年第 11 期，第 27 ~ 32 页。
- [17] 厉有为 《擦亮挂在共和国胸前的勋章》，广东深圳 《深圳特区报》，2015 年 8 月 11 日。
- [18] 厉有为 《创新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品格》，《厉有为文集》，广东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 年。
- [19] 林毅夫、李永军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 《管理世界》，2003 年第 7 期，第 21 ~ 66 页。
- [20] 林毅夫著 《新结构经济学》，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 [21]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2015 年。
- [22] 史丹、白骏骄 《产业结构早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内生性解释——基于互联网式创新力视角》，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第 105 ~ 118 页。
- [23] 王缉慈 《解开集群概念的困惑——谈谈我国区域的集群发展问题》，郑州 《经济经纬》，2006 年第 2 期，第 65 ~ 68 页。
- [24] 魏后凯、王颂吉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 期，第 5 ~ 22 页。
- [25] 习近平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北京 《求是》，2019 年第 24 期。
- [26] 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 10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tt/xjp/Document/1689558/1689558.htm>。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2 期，第 5 ~ 24 页。

作者简介：郭跃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特约研究员；向晓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 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 潘 莉]

ABSTRACTS

(1) Mechanism and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Deepening i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Guo Yuewen, Xiang Xiaomei, Wan Lu 5 •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advanced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ncreasing facilitation of global capital and industry flows today not only open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greatly hinders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ven induce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chie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finds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s SEZ has been pushed in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it has been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multi-pa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promotion.

(2) Why Is "Win-Win" Importa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 Linkage Growth?

Zhang Erzhen, Zhang Yu, Dai Xiang 30 •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based on the deep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ag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growth, "Win-win global growt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win-win" because it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moral" demand level under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an endogenous demand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the achievement of better growth performance of countr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inkage growth.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log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de condition deviation index based on the degree of imbalance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uses the cross-country data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suggest that equit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contributes to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e measurement test show that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whether i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established in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the robustness test using various surrogate indicators, so that the abov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have passed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measurement tes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 further deepen the importance of "win-wi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 linkage growth, bu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need to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openness, tolerance, inclusiveness, balance, and win-win."